

◀ (上接 10 版)

南沿海出发向日本列岛航行，未必必要经过冲绳。在中国大陆东部近海洋面上，有一股自北往南的中国沿岸流，船只可以凭借这股洋流自北向南行驶。如果离开大陆后船行驶至到舟山群岛、嵊泗列岛以东，往北不久就会遇上自南往北的黑潮向西北分出的台湾暖流，再往北就能遇上黑潮分出的另外两支洋流黄海暖流及对马暖流，就可以漂到济州岛、朝鲜半岛西南部或日本九州岛。考古发现上述地区的人们使用着相近或相同的生产工具，与其说是日韩之间的文化交流，不如认为它们有着共同的源头，即中国东南地区的百越移民。当然，移民的外徙，绝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外徙的越人，蒙文通先生认为就是《越绝书》中言及的“外越”。人们所熟知的徐福率五百童男女东渡的传说，在我看来就是数百年间东南沿海越人越洋外徙的一个缩影。

对于上述思路，有日本学者对我说，我们是学考古的，考古发现以外的材料我们一概不考虑。这种过于强调学科分类、学科特点的研究方式，令人很遗憾。从这一点上来说，考古资料既不是唯一的，更不是万能的，有时利用一些考古学以外的视野，问题或许就迎刃而解了。

永田英正：“面对每条史料，你一定要问一下，这条史料为什么以这种形式存在于这里”

陆帅：近年来历史学界似乎也有一个相对应的趋势，即研究者对考古材料的重视愈发显著，尤其是在新资料相对缺乏的中古史学界。在您看来，如果要讲考古材料作为一个独立的史料群引入中古史研究，前景是否乐观？

张学锋：目前历史学者对考古材料的重视越来越重视，但我感觉有个很大的倾向是关注出土文献。出土文献，或者说出土文字资料，研究者着眼的依然是“文字”。上世纪30年代居延汉简发现后，劳榦以其一人之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做出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



清人徐虎
《长干里客金陵
四十八景图》中
的《长干故里》

证之部》这两种巨著。然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居延汉简的研究并没有因此获得大的进展，因为以简牍内容为中心的研究课题已经被劳榦几乎言尽了。正如京都大学永田英正先生所言，劳榦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秦汉史研究专家，居延汉简中能够作为“史料”的那部分文字，几乎都被他用尽了。相反，那些一时还无法作为“史料”的文字就只能被束之高阁。

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后，居延汉简的研究迎来了完全不同的局面。虽然只是图片，但无疑人们看到了“实物”，研究者可以观察到简牍的广狭长短、文字大小、书写位置、墨迹浓淡、笔迹异同等简牍自身的很多信息，而不仅仅是劳榦给我们提供的“文字”。经森鹿三、鲁惟一、永田英正、大庭脩等学者的不懈努力，基于居延汉简的文书学研究、汉代文书行政等问题的研究得以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大丰富了两汉历史的内容。从这个事例上不难发现，劳榦的《释文》，本质上与传统的历史文献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人们之前没有看到过的“文献”而已，而基于简牍实物及其出土环境所展开的研究，才是真正对“考古资料”的利用。

因此按我的理解，利用出土文字资料展开研究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从文字跨入文物，也就是把没有文字信息的文物利用起来，从中读出历史的信息。最近收到了尊敬的前辈学者窟添庆文先生惠赐的近著《墓志所见北魏史》，功力之深，令人难以企及。然而，要想写出一部《墓葬出土文物所见北魏史》恐怕就有更大的难度。因为带到地下去的东西都是零星的，它们很难用来构建出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历史框架。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既需要了解这些材料的考古学意

义，又需要把这些材料与历史文献紧密结合，得出一些新的认识。永田英正先生在指导学生写论文时说，面对每条史料，你一定要问一下，这条史料为什么以这种形式存在于这里，如果把这个问题搞通了，这个史料你就可以用了。面对没有文字的考古材料同样要问，为什么这个遗物会以这种形态存在于这里？如果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那么没有文字的地下遗迹、遗物甚至发掘过程中见到的考古学现象，同样可以作为史料被我们利用，并且具有相当大的开拓前景。

陆帅：确实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最关注的往往是出土资料上的文字。至于那些完全没有文字的考古材料，怎样结合文献来挖掘其历史价值，可否从您的经验出发，谈一些具体的研究案例？

张学锋：我举一个小例子。前几年南京市文物部门对城南某地块进行了调查发掘，在不大的范围内清理了几十口水井，出土了很多六朝早期至北宋时期的遗物，如青瓷罐、盘口壶等。那么，在画出发掘区域的地层堆积图、水井平剖面图，对出土器物进行类型学描述与分类之后，怎样才能从中读出更多的历史信息呢？

从这一区域的地层堆积来看，生土线距地表的深度很不一样，有规律地高低起伏，可以复原出东西走向的好几列冈阜。位于冈阜之间的诸多水井，告诉我们在这一带生活的居民很多。水井出土遗物的时间上下限，说明这一区域作为相对密集的居民区，始于孙吴西晋时期，终于北宋前期。结合历史文献，我们不难判断这一带就是六朝隋唐时期著名的长干里，这个地点随着孙吴建都开始繁荣，因为南唐修筑城墙被隔在城外而趋于衰落。如此一来，这批资料就不再是起伏不平的地层线和难以计数的

坛坛罐罐了，而是具备了史料的价值。

对这一处考古的现场，想要深入发掘其价值，就必须能够同时驾驭历史和考古这两个学科的基础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目前我们的学科划分得过于细，其实不利于培养这种综合视野。因此现在有学者提倡去掉“历史时期考古”的“时期”二字，直接称“历史考古”，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陆帅：不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要有效地、亲身把握出土文物、考古遗迹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并非易事，大多时候还是会依赖考古学界的既有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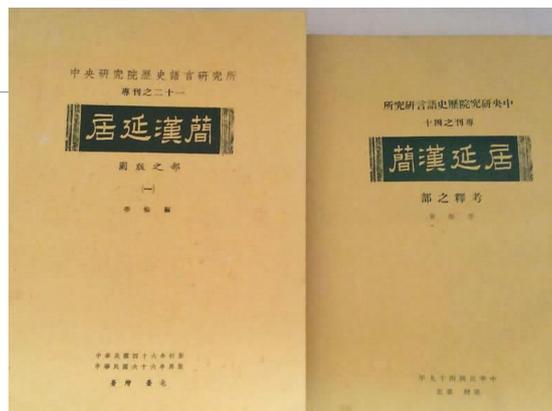
张学锋：因此系统学习考古学知识非常重要。因为考古学知识的判断及结论未必都准确，也未必完整，读者的二次发掘很有必要。

举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例子，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的发掘。西高穴大墓是否就是曹操高陵，目前还有不同意见，但就发掘资料来看，我比较倾向

于是曹操高陵，理由是出土的那些石碑。发掘者最初没有清晰地说明部分圭形石碑是征集品，这可能是引起人们怀疑其真实性的重要原因。还有，发掘者一开始把目光聚焦于圭形石碑与六角形石碑的等级差异，这或许也是导致未能准确理解随葬器物的一个原因。阅读最初的简报以后，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考古现象，出土于后室南侧室中的六角形石碑与漆木器痕迹叠压在一起，简报称这些漆木器均残，器形难辨；刻铭石碑位置集中，有的直接压在漆木器和锈蚀的帐构架之下，位置应没有被扰动。为什么会有这些漆木器的残片？侧室中原本随葬了较多的漆盒，从石碑上的铭刻可知，漆木容器中放置的是胡粉、刀尺、镜台、香囊、黄绫袍锦领袖等各式精细随葬品，为了标明随葬品的种类、数量，每个漆盒上都悬挂或捆绑有一块六角形石碑，然后上下堆放在一起。在葬事完毕以后的近两千年间，漆木容器及盒中的随葬品逐渐腐烂，但生漆皮与石碑因材质不易腐烂而留存了下来。这一考古学现象说明什么？说明这些石碑是西高穴大墓原有的随葬品。曾有人怀疑这些石碑的真实性，并由此质疑西高穴大墓作为曹操高陵的可能性。其实，只要详细解释这些考古现象，质疑便不攻自破了。

六角形石碑是配合小型漆木容器用的标记随葬品品名、数量的标签牌。这样的标签牌，汉代称“楬”。大部分楬是木质的，在考古发掘中并不少见。一些精致的楬也可以是骨质的，在考古发掘中也能看

(下转 12 版) ➔



1930年代居延汉简发现后，劳榦以一人之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做出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这两种巨著。以简牍内容为中心的研究课题几乎被劳榦言尽。

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后，居延汉简的研究迎来了完全不同的局面。